



【窥海斋】

##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

□林少华

诗和远方，远方和诗！人们正从眼前的苟且中抬起头来遥望。望天际的朝霞，望远山的落日，望雨后的彩虹，望夜空的星汉，从中感受自然与人生浩瀚的诗情——还有比这更庄严、更整肃的气象吗？

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——这样两句看似平常的歌词有一阵子曾在微信圈蹿红，人们争相传诵。或许因为我算是搞文学的，长相也多少能冒充诗人，一次在讲座会场，另一次接受媒体采访，我被两次问及“诗和远方”，问及这一蹿红现象的起因和背景。

是啊，在这不妨说是苟且成风和“娱乐至死”的时代，为什么“诗和远方”会蹿红呢？

作为起因也好背景也好，我首先想到的是“物极必反”那句老话。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，人们的生活由贫穷而温饱，由温饱而小康，由小康而逐渐富裕——基本是在形而下物质生活追求层面风风火火一路打拼一路狂奔，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或举世瞩目的成功。一句话，咱们阔了！可问题是，阔就幸福了么？吃多了，大腹便便；喝多了，头昏脑涨；玩多了，人困马乏。有形之物的占有同幸福指数的提升未必成正比，于是，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形而上精神层面——投向美，投向诗，投向远方。不用说，诗大多指向远方，远方大多充满诗意。且看唐诗（唐诗中，远方往往与水相伴）：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惟见长江天际流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（李白）“桃花尽日随流水，洞在清溪何处边。”（张旭）“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州。”（张祐）再看宋词（宋词里，远方每每写作“何处”）：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”（柳永）“何处今宵孤馆里，一声征雁，半窗残月。”（曹组）“望碧云空暮，佳人何处，梦魂俱远。”（蔡伸）“故人何处，一夜溪亭雨。”（张元干）

有人说，音乐和诗是最接近神的艺术。大约是因为诗总是捕捉和传达远方神秘的信息，而那神秘的信息又总是同心底隐藏的情思相通相连。

“诗和远方”蹿红还有一个原因：我国向有诗歌传统，产生了无数上面那样的名诗佳句，是当之无愧的诗国。我们乃是诗国子民，是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嫡系或非嫡系的后代。尽管我们现在不可能背着酒葫芦倒骑毛驴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了，或在月下僧门前反复“推敲”了，但那种文化基因，那种诗歌DNA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。潮起潮落，现在抬头醒过来了——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！

何况，即使作为日常谈资，也该谈谈远方，谈谈诗了。总不能老谈票子房子车子、老谈麻将股票减肥吧？老这么谈的人

可能也有，毕竟不能要求所有人全都谈诗。一国男女老少人人谈诗，怕也乱套了。但若完全没有人谈诗，那无疑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缺憾和悲哀。自不待言，不伴随文化、不伴随诗意的崛起，那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。世界上一掷千金也未必换来一笑的“土豪”国家并非没有。谢天谢地，国人有不算很少的一部分开始谈诗、读诗、写诗了。这大约意味着，我们开始诗意崛起、诗意复兴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！

作为“诗和远方”蹿红的第三个原因，我想是不是同乡愁有关。乡愁，大而言之，是文化乡愁。历经百年风风雨雨，我们好歹明白过来，只有我们曾百般嘲弄甚至打翻在地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“血统证明书”或自我同一性的凭依。换个说法，只有传统文化，才能让我们重拾文化自信并医治我们的文化焦虑症，才能让我们在所谓全球化中不被“化”掉，才能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，从而避免成为西装革履开着“奔驰”“宝马”的精神漂泊者。应该说，近年来勃然兴起的国学热或传统文化热即是这种文化乡愁的产物。那么，小而言之呢？小而言之，乡愁就是故园之思。由此催生了时下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热，城里人纷纷去乡村寻找石板路、旧民居、老铺子，寻找轱辘井、石碾石磨和大黄狗、老母鸡，这未尝不可以解读为城里人对中国传统乡居生活方式的确认与回望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——这大有可能是我们所有人挥之不去的世纪性乡愁。乡愁总是同时间与空间的远方连在一起，其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就是诗。不信，请看台湾诗人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：小时候/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/我在这头/母亲在那头/长大后/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/我在这头/新娘在那头……而现在/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/我在这头/大陆在那头。

诗和远方，远方和诗！人们正从眼前的苟且中抬起头来遥望。望天际的朝霞，望远山的落日，望雨后的彩虹，望夜空的星汉，从中感受自然与人生浩瀚的诗情——还有比这更庄严、更整肃的气象吗？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、著名翻译家）

□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 □设计：壹纸工作室  
□本版编辑：孔昕 □美编：马晓迪

（人生随想）

## 读书与吃苦

□雨茂

从小读书，就被灌输了许多读书吃苦的道理，比如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来梅花扑鼻香”……所有这些名言警句都有一个预设的愿景，今天吃苦，就是为了明天享福。要是没有这个美好的愿景，能否忍受得住吃苦，谁也不敢保证。问题是，吃了苦，生活未必就如期望的那般春暖花开。

东方卫视搞了个《诗书中华》的益智节目，有位选手将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说成“生于安乐，死于忧患”，点评的钱文忠老师打趣说，这与一般人的期待是一致的，人们大多希望生于安乐、死于忧患。在潜意识里，人们希望不吃苦就能获得幸福，没有人生来就愿意吃苦。范仲淹两岁而孤，母亲为了生计改嫁朱氏，范仲淹也更名朱说。长大后，范仲淹了解自己的身世，非常伤感，拜别母亲到应天府求学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范仲淹读书“昼夜不息，冬月惫甚，以水沃面；食不给，至以糜粥继之，人不能堪，仲淹不苦也”，终于在26岁时高中进士。做官为宦的范仲淹做了两件特爷们儿的事，一是“迎其母归养”，二是还姓更名。因为有这段特殊的境遇，范仲淹才堪为读书改变命运的励志模范，勤学苦读的经历对于范仲淹无异于重塑人生，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对于他来说，是再恰当不过的。

我的家乡曾为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，居于大巴山南麓，贫穷闭塞。我的求学经历颇为坎坷，在我上学时，能完整地享受小学教育的同龄人也不太多，我PK掉了大多数人进入初中，又PK掉了绝大多数人进入高中。高中二年级下学期，我被确诊为神经衰弱症，俗称“书癆”，从此开始了三年的治病求学之路。相比正常升学的高中生，我比他们晚了两年。当时我们住的是大通铺，一间教室被改造成了临时宿舍。病情最严重时，我几乎彻夜不眠，同学中谁说了什么梦话，谁打呼噜，甚至谁翻了一个身，我都一清二楚。夜深了，我看见月亮挂在中天；清晨，我看见太阳从东山升起。除了失眠，我还消化不良，整天不知道饥饿，吃一顿可以管一天。那时，生活普遍困难，许多同学营养不良、身材消瘦，我的状况更差，因为吃不进食物，加之睡眠困难，不仅瘦弱不堪，而且整天头昏脑涨。十八九岁的我似乎一阵风就可以吹倒，蹲下去就很难站起来，眼前直冒金星。有一段时期，我整天想的就是活着不如死了好，脑中盘算着用何种方法可以最快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理智告诉我，不行！我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，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我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。

我把希望寄托于治疗，村里有一个熟人在区（即现在的镇）医院当医生，是当地最有名的医生，为了治疗我的病，父亲还给医生送了礼。高二那年暑期，我每隔一周去医院一次，排很长时间的队，带回一大堆苦涩难闻的西药。医院距我家约10公里，来回步行，都是山路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。我不想与人结伴，选择独行。在潮湿闷热的山沟里行走，蚊虫不时叮咬，让人不堪其扰。稻田里水汽蒸腾，热浪滚滚，让人呼吸困难。山梁上虽然有风，但汽车经过时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，让人掩口不及。因为病人多，医生的脾气很坏，对我这样的小辈并没有多少耐心，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，才读了多少书呀，就成了神经衰弱！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，不读书，病就好了。

受了医生的奚落，病却一点不见好。父亲又托人给我找了一个专治精神类疾病的中医，这个人住在一个山沟里。父亲带我翻山越岭去看病，遇到熟人就说说走亲戚，不敢说去找某医生，因为老乡们风传我得了无法治愈的神经病。周围不少人有时很恶毒，他们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却是极大的伤害。工作以后，我不大回家乡，把父母接到身边生活，与此不无关系。医生开的药很贵，因为要用人参一类的引子，一服药有时要100多元，这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很大一笔钱。在学校煎药不便，父母就做成药丸，饭前吃一颗苦涩的中药丸是极其痛苦的，还会影响胃口。父亲决定泡药酒给我，每天至少喝两大杯，病没有治好，酒量却增加了。后来换了一位老医生，这位医生转换思路，从健脾养胃、安神养气入手，辅之以心理治疗，比如每天睡前打坐20分钟，迫使自己入定。老医生还建议我适当运动，有时间就去钓鱼。我也看了一些书，学了一些太极十八式之类的招式，想法让自己集中注意力。慢慢地，睡眠大有起色，消化也好多了，病渐渐好起来。三年后，终于考取了外省一所本科师范学院。

村上春树有一篇文章——《如果可以吃苦，那就不吃》，我认可文章的观点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吃苦，不必劝人吃苦。吃苦与享福，有时不一定有前后对应关系。况且读书未必就是吃苦，不觉得读书苦，觉得快乐的大有人在。我从怀念那三年生病苦读的日子，也不想把自己包装成励志楷模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不愿尝试神经衰弱症。但命运无常，没有神经衰弱症，可能会经历什么别的考验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我一样不会沉沦下去，这才是我最愿意与年轻人分享的体会。

（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